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QUARTERLY

SUMMER VOLUME, 2011

邓正来 主编

西方大师看中国

中國社會
科學論叢

夏季卷

2011年6月（总第35期）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QUARTERLY

SUMMER VOLUME, 2011

邓正来 主编

西方大师看中国

中國社會
科學論叢

夏季卷

2011年6月（总第35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大师看中国:中国社会科学论丛 2011 年夏季卷(总第 35 期)/邓正来主编.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11

ISBN 978-7-309-08582-2

I. 西… II. 邓… III. 中国-研究 IV. D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34647 号

西方大师看中国:中国社会科学论丛 2011 年夏季卷(总第 35 期)

邓正来 主编

责任编辑/李 婷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常熟市华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1/16 印张 11.5 字数 283 千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8582-2/D·542

定价:2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爲
了
中
國

周一良



学术委员会名单

主 编

邓正来

主编助理

程 农 吴冠军

学术委员

林毅夫	周国平	许倬云	林毓生
张维迎	孙周兴	童世骏	姜义华
许纪霖	何光沪	马 敏	黄宗智
王 焱	俞吾金	汪 晖	张曙光
葛兆光	季卫东	桑玉成	史晋川
陈嘉映	汪丁丁	时殷弘	陈平原
秦亚青	张 军	周其仁	葛剑雄
赵汀阳	林尚立	高 毅	郑杭生
陈弘毅	邓晓芒	张小劲	徐 勇
钱乘旦	陈 来	陈维纲	纳 日
徐 贲	姚 洋	张旭东	宋新宁
杨念群	郝雨凡	王铭铭	许章润
秦 晖	任剑涛	周晓虹	阎云翔
姚先国	郁建兴	朱维铮	邓正来

主办单位：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卷首语：重新发现中国

邓正来

在当下全球化的世界结构中,不仅作为中国社会科学之认识对象的“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这种认识本身所赖以凭的话语系统亦需要根据当下中国的立场进行重构——否则我们将没有基本的哲学根据去谈论所谓“中国”社会秩序的正当性问题。因此,“中国”既是中国社会科学的认识对象,又是其思想根据;换言之,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判准只能是“根据中国”。这意味着西方思想家、甚或中国先哲的思考绝对不能代替当代中国人自己的思考,西方学者、甚或中国先哲的答案也绝不是当代中国人自己的答案。因此,中国社会科学必须加强对中国问题本身的深度研究和理论关注。为此,我们必须从那种因“西方化倾向”所导致的“中国之缺位”中解放出来,重新“找回”或“发现”中国。这里的“中国”绝不是1978年以前或更为久远的中国,而是与其有着历史性关联的世界结构中的当下中国;这里的“中国”也不只是地理或人口意义上的中国,不只是经济意义上的中国,而是体现并承载着中国人之文化身份和政治认同的中国。显而易见,这里所讲的“中国”绝不是意识形态视野中的中国,亦不是中国传统知识视野下的中国,更不是西方知识视野下的中国,而毋宁是有待我们运用各种理论资源予以认知并建构的一个伦理性的文明体。

为了引导中国学者加强对中国本身的理论研究,我们特设立了一个常规性的栏目:“主题研讨:重新发现中国”。“重新发现中国”不仅需要中国学者自己的努力,更需要从国外学者的相关论述中汲取理论视野和理论资源。基于此,我们在本卷中编发了一辑“西方大师看中国”的文章。约瑟夫·奈、乌尔里希·贝克、马克·沃伦、古德蒙·赫内斯、迈克尔·斯彭斯、王国斌、杰弗里·亚历山大与汉斯·安德森、鲁克·范·兰根霍夫、古斯塔夫·杰拉茨及提林剑等来自不同国家的11位不同学术背景的西方理论大师从不同视角对当下中国进行了批判性的检视。他们的某些认识或许肤浅,但作为对当下中国的理论检视,它们至少能为我们深入认识当下中国的问题提供某种理论参照。这组文章原系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与《瞭望东方周刊》合作组织的一组文稿,现集中刊发于此,望能对我们进行中国深度研究提供某种借鉴或参照。

目 录

2011 年 6 月(总第 35 期)

卷首语：重新发现中国	邓正来 1
主题研讨：重新发现中国·西方大师看中国	
约瑟夫·奈 如何正确看待中国崛起?	1
乌尔里希·贝克 中国之于世界的使命为何?	4
马克·沃伦 中国式“治理驱动型民主”	6
古德蒙·赫内斯 中国正在进行全世界最大的社会试验	9
迈克尔·斯彭斯 从“汉学”到“中国研究”之变	13
王国斌 中国应对“地域差异”：一个值得西方深入研究的课题	16
杰弗里·亚历山大 汉斯·安德森 中国崛起挑战美国对华话语 体系	19
鲁克·范·兰根霍夫 社会科学“中国时代”到来	22
古斯塔夫·杰拉茨 中国正在应对“双重身份”困境	25
堤林剑 中国崛起后重思东亚政治模式	28
本刊专论：聚焦“邓正来问题”	30
童世骏 “话语权争夺”的知识悖论	30
许纪霖 法律秩序背后的价值危机	31
刘 擎 辨析邓正来的中国问题意识	33
刘 康 中国研究、区域研究和文化研究 ——反思人文社科学术范式	35
唐世平 “邓正来问题”：应该的问题？应该的解决方案?	37
刘清平 关于“可欲”、“正当”、“德性”的反思	39
任 远 社会转型期法治建设的合法性和内在坚持	40
郑成良 “邓正来问题”是否存在?	42
周永坤 中国元素与一般法理学	43
刘 星 法学理论多元与法律职业权威建构的关系	45
李瑜青 主体性与中国法治实践的主体性	46
蒋德海 主体性中国,还是责任中国?	48

杨春福	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中国法学的问题意识	50
黄文艺	全球化与中国法学的回应	52
徐亚文	当代中国法学的犬儒主义色彩	54
顾 肃	法学研究的特殊性与普遍性问题	56
陈润华	“困”与礼法的精神	58
林 曦	“情理”与中国法律理想图景	60
吴励生	邓氏学派及其学术正面塑造性力量	62
魏敦友	新道统论为现代中国法学奠基	68
吴冠军	“否定性”的理想图景	70
孙国东	“转型法哲学”出场的一些前提性认识 ——我对“邓正来问题”的阐发理路	73
邓正来	致谢与回应：关于《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若干问题	77
学术专论		
刘 愿	哈耶克货币非国家化理论的自然实验 ——以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国共政权货币竞争为例	79
杨 敏	瞭望文明：在共同生活中收获智慧构筑安全 ——关于比较文明研究的一种社会学分析	104
陈润华	生活世界与炼金术[甲子篇] ——体悟、解释之流变	122
海外专论		
Vincent Mosco 著 曹 晋 吴应美译	传播政治经济学：十年磨一剑后的 新图貌	139
[德] 亨利希·阿伦斯著 姚远译	法学研究课程纲要	155
书评思考		
邹 怡	叙事：记起巨变中的个人 ——读《寻路中国：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	158
学者诗思		
邓正来	“知识团结”与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发展 ——《上海学术报告》(2010)序言	165
《中国社会科学论丛》稿约		168

主题研讨：重新发现中国·西方大师看中国

中国社会科学论丛

2011 年总第 35 期

如何正确看待中国崛起？

◆ 约瑟夫·奈(Joseph Nye Jr.) * 林 曦** 译

邓小平曾在联合国大会上宣称，“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但是印度、欧洲和美国有很多人对此并不确信。

外国人对中国实力的看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未来的判断。在美国的一次民意测验中，44% 的受访者错误地认为，中国已经是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只有 27% 的人准确选择了美国（其实力三倍于中国）。

与此同时，尽管大部分对中国实力的推断都是基于其 GDP 的快速增长率，中国还拥有其他显著的、使其可能成为大国的资本。

它的人口四倍于美国，拥有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军队、约 200 枚核武器，以及先进的航空技术和数字空间运行能力（包括全球最大的互联网用户群）。

在软实力资源方面，中国仍然缺乏能与好莱坞抗衡的文化产业，大学教育水平远远落后于美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还很不够。在美国，非政府组织对美国软实力贡献巨大。

不过，自从胡锦涛主席“十七大”讲话以来，中国已经做了大量努力来提升其软实力。一直以来，中国的传统文化都令人着迷，中国政府因此在全球各地开设了数百家孔子学院来教授汉语和中国文化。中国还调整了外交策略，更多地使用多边协议来缓和世界对它的恐惧心理，减少其他国家联手制衡这个崛起中大国的可能性。

因此，虽然中国拥有过人的大国资本，但对于那些仅仅基于 GDP 增长速度和政治修辞做出的关于中国的推断，我们必须持怀疑态度。

中美两国对彼此的印象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内政治斗争的影响，双方都有一部分人愿意将对方看成是敌人。需要指出的是，夸大地相信美国正在没落或者中国实力在崛起，都将导致冒险和危险的政策。

* 作者简介：约瑟夫·奈，哈佛大学“杰出服务教授”，国际关系 Sultan of Oman 教授，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前院长。

** 译者简介：林曦，复旦大学讲师，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专职研究人员。

中国在经济上仍然远远落后于美国,而且其政策的核心还是集中于亚太地区及国内经济的发展。虽然它的经济模式(所谓的“北京共识”)对于一些国家有号召力,但还远远不具有全球意义。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国内外的决策者都应当牢记,如果我们相信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这种信念可能最终会成为冲突的根源。如果双方都相信自己有一天会与对方兵戎相见,并为此进行军事部署,另一方则会将此看成是自己最大担忧的验证。对双方而言,这种情形将是一个巨大损失。

要达到可与美国的实力和资源并驾齐驱,中国还有相当长一段路要走。而且中国仍然面临着许多发展方面的障碍。

中国 GDP 真相剖析

在 21 世纪初,如果以 PPP(购买力平价)来衡量,美国经济总量是中国的两倍;如果以官方汇率来计算,则是三倍多。但所有此类的比较和推断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不全面的。

即使中国的 GDP 在 2030 年左右超过美国,这两个经济实体也只是在规模上相当,在构成上并不平等。中国仍然拥有广大欠发达的农村,并将开始面临计划生育延迟效应带来的新的人口问题。再者,一个国家在多年高速发展之后,可能会出现增长率放缓。

如果我们假设在 2030 年之后,中国的增长率为 6% 而美国是 2%,那么中国的人均收入要想赶上美国,则要等到 21 世纪下半叶。

人均收入是一个经济体发达程度的衡量标准。换言之,中国傲人的增长率与其人口数量相结合,将肯定会在某个时刻使中国在经济总量上超过美国。这是中国令人折服的实力,但与平起平坐并不相同,况且美国也不可能在这段时间里止步不前。这也并不能证明中美两国里杞人忧天者关于战争呼之欲出的预言。

再者,对经济发展趋势的线性预测也会产生误导。一个国家在经济起步的早期阶段,从技术进口中受益之时,前景总是显得一片大好;而当经济发展达到较高层次时,增长率则会放缓。

除此之外,中国经济还面临着转型过程中的严峻挑战,包括国企效率低下、社会不平等扩大、人口大规模迁徙、社会保障系统缺失、腐败以及机制不健全等,这些都可能導致政治上的不稳定。

中国不大可能以外汇储备为博弈砝码

在过去十年间,中国在全球最大出口国的排行榜上从第九位跃居到第一位,但中国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模式可能需要进行调整。

一些观察家得出结论说,因为中国在外汇储备中持有巨额美元资产,它可以以抛售手中美元外汇相威胁,逼迫美国就范。但如果中国这么做,将降低中国所持外汇份额的价值,并导致中国商品难以进入美国市场,进而给中国经济造成莫大损害。经济体之间的互相依存是对称的,而非任何一方实力的体现。如果中国试图使用其金融实力为博弈砝码,也许可以使美国屈膝就范,但同时也会让自己跌倒在地。

此外,虽然中国拥有大量的外汇储备,它在用自己的货币向海外放贷、增加自己的金融影响力方面仍然困难重重。在中国形成一个深入且开放的债券市场(市场中利率由市场而非政府决定)之前,大概只有很少人会购买以人民币计价的资产。

人们更愿意看到中国经济腾飞,而非军事崛起

这一代的中国领导人意识到,快速的经济增长对于国内政局稳定来讲至关重要。他们专注于经济增长以及他们称之为“和谐”、不会扰乱其增长的国际环境。但人们经常将年轻一代的中国人描述为极端民族主义者,他们要求对中国实力予以更多的承认。

有美国人担心说,中国意欲“在短期内取代美国成为东亚霸主,在长期内将挑战美国在全球范围内超级大国的地位”。即便这是对中国意图的一个准确看法,我们也应该怀疑,中国是否具有军事实力来使这个想法变成可能。

再者,中国领导人将不得不疲于应付周边国家的各种反应。

中国的军事态度如果太强硬,这一区域的周边国家可能会结成一个对抗性联盟。这个联盟将会同时削弱中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

皮尤(Pew,美国一家调查公司——译者注)最近对全球范围内 16 个国家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发现人们更愿意看到中国的经济腾飞,而非军事崛起。

“如果中国的主要角色是经济大国,则受访者很可能既赞成中国的崛起,又喜欢美国。而如果受访者主要将中国看成是一个不断崛起的军事大国,则他/她的亲美情绪将常常意味着不赞成中国的崛起。”

中国不太可能成为美国在全球范围内一个对等的竞争者,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中国不能在亚洲范围内挑战美国。

我们不能完全排除冲突的威胁。但是到目前为止,美国已经接受了中国实力的崛起,并且邀请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参与到国际体系中来。

亨利·基辛格已经观察到,中国正在国际体系中要求更多的承认,而不是颠覆整个体系。

考虑到美中两国在未来都将面临的全球问题,我们能从合作中获益良多。在各自的国家里,都应该避免“冲突不可避免”的这种看法。我个人的观点是,一个相对良性的美中关系未来,是双方都愿意看到的,也是可以实现的。

中国之于世界的使命为何？

◆ 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 杨晓畅**译

过去几年内,我数次到访中国,并和许多同行、知识分子和政治家进行了讨论。访问期间,我发现,中国具有一种反复实验的精神,这种精神是我在西方世界没有发现的。

请让我来举三个这方面的例子。它们是:欧洲危机、中国日益加剧的个体化倾向和中国的生态化转向。

中国正在经历特殊的“去政治化”

欧洲危机始于雅典,并蔓延至里斯本和马德里,或许也包括伦敦。然而,认为正在蔓延的主权债务危机仍仅限于欧元区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这一危机是整个西方世界的财政危机。

而令我大为惊讶的是,希腊危机正在影响美国,但似乎并未影响中国。西方坚信的美国是“避风港”的看法因此显得很滑稽。

因此,我和其他许多人都想知道:在个人和国家共同经营的中国经济中,抵制这种主权债务危机的力量从何而来?

无论是欧洲,还是中国自己,都认为中国的社会生活是由集体认同主导的,因为中国的集体制结构是由儒家伦理和共产主义政策共同建构的,而个体行动和选择却没有占据多少空间。

然而,现在的实际情况是,中国正日益变得个体化——不仅人们对个体的认知正在改变,而且人们对个体自由、个体选择和个体性的期望值也正在增加。

正如中国学者阎云翔的研究所揭示的那样,个体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单位,与此同时,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等各领域的变化也正在进行。中国的发展道路正在以一种完全不同于我们欧洲过去和现在所经历的方式而展开。在中国,个人的重要性与欧洲不同,它既不彰显于制度性的安全框架中,也不以公民、政治和社会基本权利为基础。在中国,宪法没有确定个体化的地位之前,对经济、劳动力市场、日常文化和消费的管制就已经开始放松了。

* 作者简介:乌尔里希·贝克,世界社会理论大师,德国慕尼黑大学教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学术委员。

** 译者简介:杨晓畅,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专职研究人员。

因此,当下的中国正在经历一个非常特殊的“去政治化”过程,也就是以市场为基础的个体化进程,而其结果尚不得而知。

在中国通往现代化和个体化的道路上,存在着一个标志性的矛盾:短期或长期的中国模式——“无(政治)参与的个体化”——是否可能?

还有第三个例子也引发了我的思考:在西方国家,推动国家(和全球)从高碳到低碳经济转型的创新体制引发了大量的辩论和冲突。然而,中国正在进行这种制度创新!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独立的温室气体排放者,同时作为一个飞速发展的经济超级大国和未来潜在的地缘政治超级大国,中国堪称全球低碳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

发展“中国世界主义”是否可能

提到上述三个问题,我主要想说的是:中国将向世界提供的愿景、对世界负有的使命究竟是什么?

在我参加过的关于中国的众多讨论中,我尚未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只要中国的国家发展规划成功了,中国就将不断地发展出一种关于世界的“想象”,并调动中国的文化力量,使其与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相匹配——即使中国明确否认自己是全球的主导力量。

然而,中国任何这样的发展规划都必须为更大的世界提供答案,而不是仅仅甘愿做眼中只有中国的中国——即使是一个伟大、繁荣的中国。

我的核心观点是,发展出一种来自中国、但能够被世界普遍接受的“中国世界主义”理论体系(*Chinese cosmopolitanism*),对于中国是一项真正的、格外困难的挑战。(我甚至不清楚,“世界主义”这个西方概念,能否在中国找到一种适当的译法。)

在这里,请允许我引用一些同行的观点。我的一位同行坦言,“‘人道’(humanity)并不是一个通用的中国概念”,尽管中国也有儒家人文传统。他说,他是刚刚认识到这一点,并且是通过国际合作获得的这种认识。

另一位社会科学家指出,她是从自己在国外的经历中学到了一种“人文精神”。她也动情地补充道,“我在英国期间获得的最大收获是,这段经历使我开始思考‘他者’,并关心‘他者’,无论他们来自何方”。

但与此同时,他们都强调明确承认中国国家发展地位和恢复对中国文化尊重的重要性。上述观点又是否开启了一种特殊的“中国世界主义”呢?

德国前总统霍斯特·科勒并不是一个以讽刺和幽默著称的人。但前几天,他讲了一个有关中国的笑话。这个笑话在德国人听来非常有趣。科勒说,有一个非常友善的中国商人对他讲,“亲爱的总统先生,我要告诉你的是,我最喜欢购买的是德国工厂和企业!它们组织管理得如此之好!”

这就是我要讲的关键:中国相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愿景和使命,绝不应仅仅是富有和友好的中国老板在全世界到处大手笔花钱。

中国式“治理驱动型民主”

◆ 马克·沃伦(Mark E. Warren)* 樊 安**译

像所有来上海的游客那样,我对中国的一些基本情况有所了解。

它的人均 GDP 虽然还比较低但正在高速增长。它的中产阶级正在壮大,其总人数不久将赶上美国人口。它的基尼系数正在上升,现在几乎与美国持平。

将如此大规模的人口组织起来谋发展自然是一项极为庞大的工程,这每每令我震惊,就像大多数来上海的外国游客一样。

巨大而完美的现代化浦东机场、通往市区的时速 432 公里的磁悬浮列车、途中不断闪现的摩天大楼和相对高效的公共交通,所有这些都令我惊叹不已。

还有一点让我惊愕的就是人口:上海及其卫星城的人口就相当于我所居住的加拿大的总人口。我在一些老城区也窥见了中国比较贫穷的一面,而且我也知道,在这个城市之外,这样的地方还有很多。

但是,总体而言,中国充满活力且运转相对正常,也取得了一些惊人的成就,比如 2008 年北京夏季奥运会。但最了不起的,仍然是中国 8% 至 12% 的年度经济增长率和“世界工厂”的地位。

上述这些评论并没有什么独到之处。但另一个问题却会吸引政治学者的兴趣: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做到这些的?

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做到这些的

对政治学者而言,中国是一个谜。政治学界的一个共识是,类似于威权式的政府往往外强中干、能力低下。产生这一共识的原因在于这种政府的机能:它等级森严的指挥控制体制不利于激发下级的积极性,尤其不利于激励下级去完成一些需要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复杂任务。它不善于传播和管理信息,往往为维持自己的合法性而犯难。

换言之,作为组织形式,它几乎缺乏所有那些能够使结构复杂、处于高速转型中且需要创新精神的社会正常运转的特质。

* 作者简介:马克·沃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 译者简介:樊安,昆明理工大学法学院讲师。

于是观察者就产生了这个问题：在缺乏民主体制的那些“能力”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是如何成就并动员一个能够创下丰功伟绩的社会的？

中国的经济规模如此巨大并且愈来愈复杂，中国政府是如何保持 8%—12% 的年 GDP 增长率的？它是如何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保持在 70% 的水平的？这么高的信任度在发达民主国家几乎闻所未闻。

在公民的期望值正随着国家财富的增长而增高的同时，中国政府是如何用发展来代替福利、教育和医疗等制度的？在应对与发展相伴而生的环境挑战的同时，中国政府将如何解决能源供应的巨大难题？

“由政绩来获得合法性”体制

有时候我们的理论不会引导我们进行正确的提问。就中国来说，我的大体印象是，首先，我们要采取这样的理解方式——中国政治体制之所以如此，是由于推行了一种“由政绩来获得合法性”的体制设计：只要能履行诺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就不会动摇。

但这里又有一个悖论：履行诺言是个巨大的治理难题，需要一些能力，比如通过复杂的谈判协调相关利益者之间的冲突，使国内外投资者确信他们能够从投资中获利，根据优点和能力选择领导人，确保信息传播和交流的同时防止出现政治僵局，解决腐败问题，以及提供一个足够安全和稳定的环境，使公民可以为将来做打算和投资。

我认为，在上述各方面，中国和很多国家的相似之处最具启发性。而与中国相似的国家并不是那些人均 GDP 与之相当的“发展中”国家，而在于中国和发达民主国家之间。

无论像中国的这种体制，还是竞争性的多党民主体制，完全依靠政绩来获得合法性的政治体制必须欢迎创新，保持信息通畅，把官员的政绩作为升迁的根据，对众多不同组织和行动者的各种利益加以恰当排序。

最后这一点相当重要，因为，如果一个政治体制没有合法性，那么它就必须使用各种各样的强制措施和诱导手段来服从。

过去数十年间，发达民主国家已经发现，选举民主制自身并不足以保证政府拥有上述那些治理能力。这并不奇怪：选票就是一种工具，公民可以用它来抛弃表现不佳的坏政府，这个工具虽然重要却又很粗糙。

于是，民选政府往往发现它们通过选举获取的合法性并不会自动转变为治理能力。

为此，发达民主国家已经在通过一些所谓的“补充性”民主程序进行改革。这些程序被冠以各种名号，比如公开听证、公共论坛、利益相关者会议、共识会议、审议论坛等。

这类程序通常都重点关注具体的政策制定，例如某条高速公路的选址、对转基因生物的监管、水权的分配、国有森林利用纠纷的解决，等等。它们的共同点在于，都是在回应各种治理难题和法律僵局。

中国令我吃惊的地方就在于，它面临着与上述治理难题相似的问题。实际上，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更大程度上依赖于政绩，它必须更加注重自己的执政表现。

于是我们有了一个或许会令很多人大跌眼镜的发现：中国正在试验的许多治理手段与一些日益在发达民主国家中盛行的治理手段如出一辙。

中国共产党已经鼓励各种级别的政府和不同机构试验各种公民论坛，这些论坛有一部分是审议性的，有很大一部分是“协商性的”，重点关注的都是制定出积极反映民意的政策。

而且,正因为选举制度还不健全,中国共产党比发达民主国家更注重依靠一项项政策获得的合法性。中国共产党必须要比民选政府更加努力地工作以使其所有内部反应机制正常运转。它必须不停地找寻新方法去避免我们所熟知的几乎所有通病。

未来,这些决策方式或许会成为常规而非例外

这些相似的手段却体现了一条通向民主的替代性路径——这就是我在别处所提到过的“治理驱动型民主”。

现在,中国政府为了确保体制得以运行——使体制对冲突更加敏感、更加以规则为导向、更加尊重公民的司法救济请求权、更少专断、更注重公民安全,进行了很多的治理改革,把那些在政策制定和决策中受到影响的人纳入了决策考量之中。

所有这些改变,都可以被看成是朝向“治理驱动型民主”迈进过程中的也许微小却非常有意义的进步。

如果能够产生这些结果,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这些转型正在造就一种更加民主的政府,即使它没有多党选举。在未来某个时刻,这些决策方式或许会成为常规而非例外。

当然,这种发展路径要冒很大风险。但我认为,它是未来可能产生的情形——在一个外部观察者看来,这种情形似乎最为符合中国的发展路径。

中国正在进行全世界最大的社会试验

◆ 古德蒙·赫内斯(Gudmund Hernes)* 樊安**译

可以说,自 1492 年欧洲人发现美洲到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间的这段时期是“欧洲世纪”,不论从全球扩张、帝国主义和军事支配方面来看,还是从进出口比率和推动科学进步这些方面来看。

同理,我们也可以说,20 世纪是美国世纪。同样,这既是从经济实力和生产革新(从航空业到日常照明业)方面来看,也是从全球支配力和军事实力来看。我们还可以加上文化——谈到美国文化的影响力,提提好莱坞、爵士乐和流行音乐就足以服人了。

以同样的方法可以得出结论:21 世纪将会是亚洲的世纪。亚洲正在成为全球化进程的“舵手”——它促使世界其他地区发生改变,不仅影响它们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变迁,还影响它们的文化潮流和身份问题。国际影响力的图景正在被重新描绘。这些结构性变化将迫使各大洲重审自己的政策和战略。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说,中国正在进行全世界最大的社会试验:它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经济变化最快的国家,社会转型正波及全国所有族群、地区和城市。

由于我来自欧洲,我将主要以欧洲为参照系来看待中国的变化;又由于我是个社会科学研究者,我将主要关注中国的变化给社会研究提供了哪些海量机遇。

世界人口结构中,欧洲将持续边缘化

人口构成具有决定性意义。根据人口统计学的研究结果,由于欧洲人口占世界总人口比重不断降低,再加上持续低生育率、人口老龄化以及移民压力,欧洲将“在世界人口结构中一直处于边缘地位”。在 20 世纪初的 1900 年,欧洲人口占了世界总人口的 25%;到了 2000 年,这个比例降了一半;到 2050 年,它还将进一步降到约 7%。

与此相反,亚洲人口在世界总人口中的比重一直保持并将继续保持在 55%—60% 左右。世界上人口最多的 10 个国家有 7 个在亚洲。在 1900 年,比利时和菲律宾拥有相同的人口,大约 700 万。根据联合国的预计,到 2050 年,比利时人口将为 1 000 万,而菲律宾则将是 1.27 亿。更不用说,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亚洲最大

* 作者简介:古德蒙·赫内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社会科学委员会前主席,挪威社会学家。

** 译者简介:樊安,昆明理工大学法学院讲师。